

【比较政治】

当代美国的政党政治极化： 动因、走向与影响

王 浩

【摘 要】当代美国的政党政治极化是美国政治研究的重要内容。美国政治研究分为制度研究、结构研究与过程研究三类,其中制度和结构是静态的,过程是动态的。因此,对当代美国政党政治极化的深入探讨,需要综合制度性、结构性及过程性要素,构建一个系统分析框架。当前,国内外既有相关研究已形成四种主要模式:经济—阶层模式、制度—规则模式、宗教—文化模式和意识形态模式。这些模式由于聚焦静态的制度和结构维度,对过程维度关注不足,因而忽视了当代美国政党政治极化与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政党政治极化的根本差异,由此欠缺对其动因、特征与影响的充分理解。为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引入联盟重塑和政党重组两个相关联的过程性变量,表明美国的政党政治格局在理论上包括非对等极化、非对等协商、对等协商和对等极化四种形态,而当代美国政党政治极化的本质特征在于其以20世纪70年代的国内政治联盟重塑为核心变量、以政党重组为中介变量、以政党政治格局重构为因变量,形成了民主、共和两党对等极化这一最极端形态。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美国政治的演化态势反映出政党政治格局的新一轮重构已开启,对等极化正进一步衍生为断层极化。

【关键词】美国政治;联盟重塑;政党重组;对等极化;断层极化

【作者简介】王浩,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

【原文出处】《美国问题研究》(沪),2020.2.170~203

【基金项目】本文系笔者主持的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美国政治转型对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研究”(项目批准号:19YJCGJW012)的阶段性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

“这只是一场非法的、基于党争的未遂政变……这场政变将导致你们(民主党)的严重溃败……你们不仅是在打击作为总统的我,也是在打击整个共和党……历史会严厉地审判你。你的遗产将是把众议院从一个受人尊敬的立法机构变成一个实施党派迫害的专断暴虐法庭!”^①2019年12月17日,在美国国会众议院表决通过对其“滥用职权”和“妨碍国会”两项弹劾条款后,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J. Trump)总统在给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及弹劾发起人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的抗议信中,表达了上述强烈愤慨。自2018年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中民主党时隔八年重新取得众议院多数席位后,以特

朗普和佩洛西之间的明争暗斗为缩影的两党政治较量便持续升级,并随着弹劾调查和审判的推进达到高潮。尽管2020年2月5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分别以52票反对、48票支持和53票反对、47票支持的结果否决了对特朗普“滥用职权”和“妨碍国会”的弹劾,但与其说这是参议院对自身“弹劾政府官员”这一宪法赋予的神圣职能的忠实履行,不如说是继不久前众议院通过弹劾条款后又一次鲜明的以党派划线的政治斗争。^②

实际上,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政争所反映出的国内政治生态持续恶化,一直是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只不过特朗普执政后的两党博弈将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作为冷战结束之初美国式

自由民主和所谓“历史终结论”的鼓吹者,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对美国政治的批判和反思尤为耐人寻味。他在2014年出版的《政治秩序与政治衰朽》一书中提出,“否决政治”(vetocracy)已开始主导美国政治的运作,导致的后果是否决为上、治理为下、党争不断、效率低下。福山认为,引发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自19世纪末以来,美国的两大政党从未如此两极分化过……民主制度并非为终结冲突,而是为通过共同制定的规则和平地解决冲突……但是当党派极化遇上美国式的民主制衡体系,结果就是灾难性的”^③。概言之,在福山看来,美国否决政治的出现和政治生态的恶化在于政党政治极化(partisan polarization)的不断加剧。

那么,我们应如何理解当代美国的政党政治极化这一重要现象?如果按照福山的说法,近年来美国政党政治的极化已达到一百多年来前所未有的程度,那么与历史经验相比,当代美国政党政治极化加剧的动因是什么?这种极化有哪些特征,又对美国政治造成了何种影响?同样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美国两党斗争烈度的进一步上升,是否意味着当前美国的政党政治极化正在步入一个新阶段?为了回答这些重要的学理和现实问题,本文将在总结与反思国内外既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新的系统分析框架,用以探究当代美国政党政治极化的动因、走向与影响,并运用该框架对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美国政党政治极化演变的新趋势展开讨论。

二、既有研究的总结与反思

当代美国的政党政治极化问题,是当代美国政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政治研究一般可以分为政治制度(political institution)研究、政治结构(political structure)研究与政治过程(political process)研究三大类。其中,政治制度研究主要涵盖美国宪法规定的国家和政权组织形式(联邦制、总统制、三权分立与权力制衡)以及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政治结构研究主要指向民主、共和两党的政治力量对比连同各自核心选民群体在经济、阶层、宗教、族裔、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构成;政治过程研究则重

点追踪政治结构如何被重塑,以及在此基础上主要国内政治行为体如何通过政治制度工具推进各自的政策议程。

不难看出,美国政治研究中的上述三类要素是彼此高度关联的。其中,制度与结构是静态的,过程是动态的。如果说制度研究是贯穿整个美国政治研究的“筋脉”,那么结构研究就是实质性的“肌体”,过程研究则成为“血液”。正是血液通过筋脉的持续流动,才使肌体得以新陈代谢。因此,全面理解和深入探究当代美国的政党政治极化这一重要问题,就需要综合制度性、结构性和过程性三种要素,最终构建一个有机的系统分析框架。

截至目前,学界对政治极化概念的界定通常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相互之间的差异性,二是各自内部的同一性。^④当代美国的政党政治极化,则主要指的是民主、共和两党在意识形态和政策立场等方面的差异性越来越大,同时各自内部的同一性越来越高。^⑤回顾历史,美国的政党政治极化并非一种晚近现象。按照既有相关研究,早在美国内战爆发前,政党政治极化便已出现,而南北双方在奴隶制存废问题上的针锋相对以至于兵戎相见则是极化的结果。^⑥内战结束后,民主共和两党之间的政治极化更是成为常态,其背景在于进入“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的美国伴随经济快速发展而来的社会贫富分化,使不同社会阶层的矛盾日益尖锐。最终,20世纪20年代末爆发的经济大萧条打破了内战后形成的政党政治格局,终结了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 liberalism)在美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导思想地位,当代自由主义(contemporary liberalism)理念演变成为两党精英相互妥协后的共识。^⑦由此,美国政治暂时结束了党派极化状态,进入“新政共识”时期。然而好景不长,自20世纪70年代起,随着当代自由主义在经济社会治理方面暴露出的问题越来越多,加之美国经济出现“滞胀”、越南战争引发社会强烈反弹、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等诱因,美国的政党政治极化再次出现并愈演愈烈,以至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达到甚至超越了此前任何一个时期。^⑧基于以上历史回顾可以看出,当代美国的政党政治极化研究所涵盖的时

间范畴是20世纪70年代至今。

(一)当代美国政党政治极化的四种既有研究模式

随着美国经济、社会与文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的一系列重要变化以及相关研究的逐步深入,围绕当代美国的政党政治极化研究,国内外学界已形成四种主要研究模式:经济—阶层模式、制度—规则模式、宗教—文化模式以及意识形态模式。

(1)经济—阶层模式。这一研究模式认为,当代美国的政党政治极化植根于20世纪70年代,即所谓“新镀金时代”(the new gilded age)以来,美国国内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尤其是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在财产和收入两方面的贫富分化。^⑨美国政治学者诺兰·麦卡蒂(Nolan McCarty)等人的研究发现,自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的基尼系数变化与国会两党政治精英的极化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例如,由于共和党人主要代表社会高收入阶层,因此他们往往没有意愿去改革现有不平等的财富及收入分配政策,反而倾向于强化现状,甚至采取更为极端的立场,而无需付出任何政治代价。^⑩上述趋势使得自新镀金时代起,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思潮——强调有限政府、减税、放松金融监管、平衡预算和完全市场自由——及其泛滥加剧了美国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失衡,导致经济金融化、制造业空心化及不同社会阶层财富和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⑪在这一背景下,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政治中间主义渐趋终结,民主党代表的社会中低收入阶层与共和党代表的高收入阶层之间的共识日益减少,政治极化随之产生,并在实践中表现为阶层对立、党派斗争和随之而来的国家治理效率下降。

(2)制度—规则模式。这一研究模式认为,自立国时起,美国式的自由民主体制以选举、代议制、两党制和三权分立/权力制衡为总体框架的政治制度和规则设计,本身便为政党政治极化埋下了伏笔。^⑫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制度和规则的实际运作及其改革过程中,政党政治极化进一步加剧。例如,当代美国日益开放和更为直接的政党初选(primary elections)制度,使政策主张更为极端的候选人更容易动

员其选民并最终胜出,由此扩大了党派间的政策分歧。^⑬又如,近半个世纪以来,民主、共和两党在每十年一次的选区重划中基于自身利益而进行的操纵(gerrymandering),大幅增加了各自的“安全选区”、减少了“摇摆选区”,从而加速了政党政治极化趋势。^⑭再如,以政党集权为取向的国会规则改革,成为政党政治极化的又一动力,^⑮其中主要包括党鞭(party whip)制度的强化、分委员会地位的提高和政党领袖权力的上升。^⑯总之,美国的政治制度和规则已成为两党斗争的有效工具,由此导致国内政治僵局频现,政党政治极化成为常态。

(3)宗教—文化模式。这一研究模式认为,宗教尤其是新教及其文化始终在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随着当代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一个日益“世俗化的蓝色美国”(Secular Blues)与一个愈发“宗教化的红色美国”(Religious Reds)之间在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开始形成越来越大的反差、分歧和冲突,进而成为当代美国政党政治极化的根源。^⑰对此,有学者甚至用“文化战争”(culture war)来描述这种冲突的烈度。^⑱“两个美国”(two Americas)之争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civil rights movement)、“反文化运动”(counter-culture movement)和70年代的“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并在近几十年里愈发明显。“世俗化的蓝色美国”支持民主党,多以少数族裔、女权主义者、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年轻人和城市选民为主,他们笃信多元文化主义、支持女性和少数群体权利,在堕胎和同性婚姻等社会议题上持激进立场。“宗教化的红色美国”则成为共和党的拥趸,多以新教徒尤其是基督教右派和传统福音派新教徒、白人保守主义者为主。他们笃信主流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即“瓦斯普”或WASP文化),在社会议题上持保守立场,主张维护传统价值观。上述“两个美国”的对立使得当代美国的政党政治极化被赋予了显著的宗教—文化元素。

(4)意识形态模式。这一研究模式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民主、共和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两极分化是美国政党政治极化的主要推手。从20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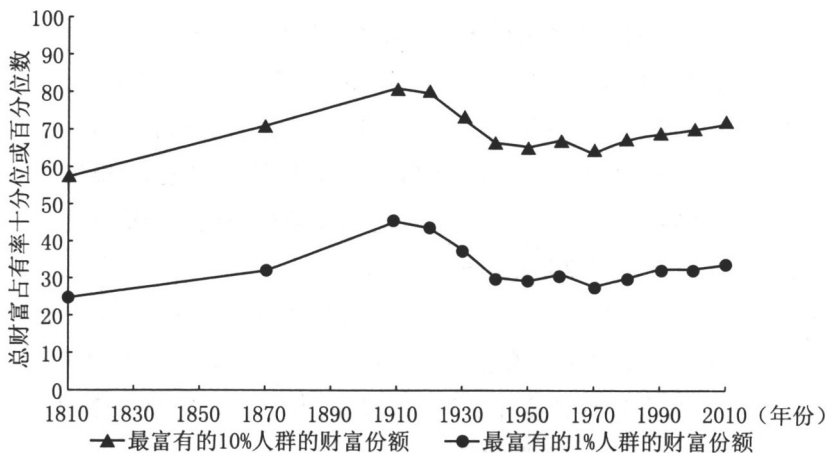
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到60年代的越南战争期间,当代自由主义一直是美国政治社会的普遍共识。在此期间,两党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各自内部都有大量自由派和保守派,甚至出现保守派民主党人比自由派共和党人在政治意识形态光谱上更为偏“右”的特殊景象。基于此,政治中间主义一度成为这一时期美国政党政治的主流。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总结这一时期的美国政治时,诧异地得出了“意识形态终结”的结论。^⑩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民主、共和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极化却再次出现,民主党的自由主义和共和党的保守主义分别占据了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地位,保守派民主党人与自由派共和党人在美国政治中逐渐消失,意识形态对立取代妥协成为美国政治生态的新特点。^⑪结果是,当代美国政治日趋“部落化”和“碎片化”,持有不同意识形态立场的政治力量和社会群体在各类国内政策议题上分庭抗礼,使当代美国国内经济、社会改革的效率相比“新政共识”时期大幅下降。

(二)既有研究模式的不足与反思

以上四种主要研究模式为我们分析美国的政党政治极化提供了重要的观察视角和学理依据。然而,它们无一例外地聚焦于政治制度和政治结构两个静态维度,忽视了对动态的政治过程要素的关注,因此在对政党政治极化的理解方面显得机械、笼统,

没有系统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历史地审视当代美国的政党政治极化与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政党政治极化之间的根本差异,进而欠缺对其动因、特征与影响的有针对性的剖析。

首先,无论经济—阶层模式还是意识形态模式,都不能有效解释当代美国政党政治极化(包括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党派斗争)的程度,为何显著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一方面,当代美国社会不同阶层的贫富差距虽然持续扩大,但整体上仍小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例如,1910年时美国最富有的10%的人口占有社会总财富的约80%,其中最富有的1%的人群财富占比达45%;到2010年时,美国最富有的10%的人口占有社会总财富的约70%,其中最富有的1%的人群财富占比不到35%(见图1)。^⑫此外,在当代美国社会贫富分化日益悬殊的同时,社会福利制度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反观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在美国和西方盛行的时期。^⑬因此从相对意义上讲,镀金时代美国社会中下层的生活境遇比新镀金时代更为糟糕。显然,经济—阶层研究模式对当代美国政党政治极化何以登峰造极的解释远非充分。另一方面,就意识形态而言,当代美国民主、共和两党间的两极分化是否比19世纪末20世纪初更为严重?答案可能也是否定的。早在具有象征意义的189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威廉·布赖恩(William



资料来源: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2014, p.428。

图1 1810-2010年美国社会贫富分化的总体态势

Bryan)便痛斥共和党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政策,大声疾呼关注“挣扎中的民众”、制约工商业寡头权力;共和党候选人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则极力维护既有自由主义政策。^②自此,两党意识形态极化正式成型并不断加剧,以至于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执政时期,民主党的几乎所有进步主义改革都被共和党主导的国会加以阻挠和否决。^③不难看出,单纯的意识形态研究模式难以有效地论证新镀金时代和镀金时代的政党政治极化程度孰轻孰重。

其次,制度—规则模式在研究当代美国的政党政治极化时,则存在倒果为因的明显逻辑缺陷。本质上,当代美国史无前例的政党政治极化是因、以冲突和对抗为导向的制度—规则改革是果,只不过后者在实践中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了前者的发展。因此,制度—规则模式更多的是在探讨当代美国政党政治极化所导致的后果及其影响,本身无法真正阐释这一极化的根源(制度—规则至多是一个中介变量而非核心变量)、也无法提供为何这一极化较之历史上任何一次极化程度更深的有说服力的答案。

最后,宗教—文化模式对于当代美国政党政治极化加剧的分析,固然看到美国社会不同群体因道德认知及其标准差异而产生了政治上的对立、形成了相互竞争的道德观,但大部分美国人在这一问题仍属于中间派,因此宗教—文化因素在当代美国政党政治极化发展中的作用不应被过分夸大,或者更准确地说,透过宗教—文化模式观察当代美国的政党政治极化是十分片面和狭隘的。已有研究发现,宗教—文化因素对政党政治极化的影响确实在上升,但二者间的相互作用主要与上层白人有关,而非美国社会中的普遍现象;对于广大社会中下层来说,当代美国政党政治中更为重要的议题仍然是经济、就业和社会福利。^④因此,没有证据显示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已沿着宗教—文化界限而出现高度极化。^⑤

综合以上总结和反思,笔者认为,要想真正明确当代美国的政党政治极化与美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

政党政治极化之间的根本区别,进而有针对性地充分理解其动因、走向与影响,就需要对已有研究模式进行优化,在政治制度和政治结构要素的基础上加强对政治过程要素的考察。为此,本文致力于引入联盟重塑与政党重组两个过程性变量,运用比较研究方法,构建一个“制度—结构—过程”三位一体的当代美国政党政治极化分析框架。

三、把政治过程找回来:联盟重塑、

政党重组与美国政党政治格局的四种形态

(一)联盟重塑与政党重组:内涵及作用

美国是一个先有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契约精神和法治传统,后又形成联邦政府(federal government)的国家,加之自由主义十分强调个人权利、理性主义和有限政府,因而自其立国时起——按照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说法——美国便已存在一个具有强大自治能力的多元化社会。^⑥与此同时,作为全球最大移民国家,不同文化和肤色的人们秉持自由主义原则在这里共生共存,形成了多元化的族群利益,这也成为美国的一大特质。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极具影响力的多元主义民主理论就指出,利益多元化和权力多元化是美国社会的重要特征,前者使人们可以根据自身利益需求自愿成立或加入各种组织,后者则使众多组织与国家分享权力变得可能。^⑦在上述背景下,竞争性选举与代议制民主的政治制度框架,便赋予各类社会力量影响政治精英内外政策制定的手段和渠道。这一系列独特经验致使美国采用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政治发展路径,通过代议制民主这一中介将国家与市民社会连结了起来,其中人民通过由他们定期选举产生的代表来行使对政府的最终控制权。基于此,在美国的“国家—社会”关系中,社会力量更为强大。正如美国政治学者理查德·本塞尔(Richard Bensel)声称的那样,社会力量在美国政治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根本作用。^⑧

在政治实践中,美国这一特殊的“国家—社会”关系使得民主、共和两党各自逐步形成了以经济、阶层、宗教、文化和意识形态等为“界标”的核心选民群体,即国内政治联盟(domestic political coalition)。按

照多元主义和代议制民主理论的逻辑,建立在社会力量及其利益诉求之上的国内政治联盟,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党和政治精英的命运。^⑨因此从社会科学的“理性人”假设出发,美国两党及其政治精英从赢得竞选、连任以及推进自身政策议程、最大限度实现各自政治利益等党派和个体政治理性出发,在制定内外政策时便不得不考虑其所代表的国内政治联盟的利益诉求。

回顾历史,美国国内政治联盟的构成及不同联盟之间的力量对比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由此造成的联盟利益变化,出现相应的分化、组合与再造,这一政治过程就是联盟重塑(coalition reshaping)。基于国内政治联盟对美国政党政治格局的决定性塑造作用,联盟重塑便成为在实践中推动美国政党政治格局演化的核心变量。由于美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阶段性和周期性,国内政治联盟往往同样呈现出阶段性特征,联盟重塑也随之成为一种周期性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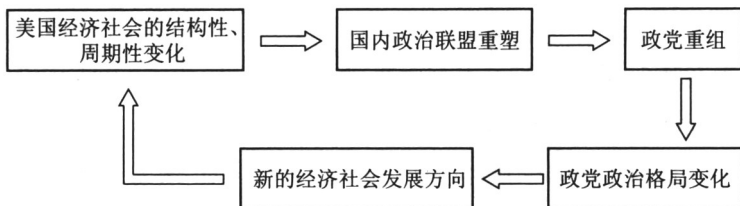
例如,美国内战爆发前,来自东北部和南方的不同政治联盟便在国会围绕如何同前宗主国英国进行贸易展开激烈斗争。一方面,由于东北部工商业发达,工商业和金融界及其利益代言人联邦党(Federalists)主要通过对外贸易获取经济利益和相应政治好处,故而主张与英国保持友好关系。另一方面,美国南方则以农业和种植业经济为主,所以代表南方利益的民主共和党人(Democratic Republicans)反对英国商品大量涌入美国,主张对英采取强硬政策,保护南方地区落后的产业。^⑩南北两大政治联盟在贸易问题上的尖锐对立成为当时美国政党政治极化的决定性因素。然而半个多世纪以后,随着美国南方经济开始从种植业向国防军工产业转型,南北双方基于共同利益,开始在贸易问题上从对手变成盟友,一致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的国际秩序。自此,一个东北部—南方主导性政治联盟形成,构建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支撑美国自由国际主义的中坚力量。^⑪上述两个历史案例鲜明地体现了美

国政治中联盟重塑的内涵及其重要意义。

与美国的市民社会通过代议制民主这一桥梁发挥其对政府的最终控制作用一样,作为推动美国政党政治发展演化的核心变量,政治联盟的重塑在政治过程实践中也需要一个中介变量——政党重组(party realignment)——以将其影响传导至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道两端。从定义上讲,美国政治中的政党重组指的是民主、共和两党的国内政治联盟(或选民基础)在某次或某几次选举之后出现的明显且持续的变化,进而造成政党力量对比的改变,使旧的政党政治格局瓦解、新的政党政治格局形成。^⑫由此可见,周期性的联盟重塑通过政党重组引发了美国政党政治格局的重构,进而使此消彼长的国内政治力量在历史进程中不断校正美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变革的航向(见图2)。下文将分别通过理论探讨、历史回顾与当代追踪,论证联盟重塑与政党重组两个政治过程性变量如何作用于美国政党政治格局的演化。

(二)联盟重塑、政党重组与美国政党政治格局的四种形态:理论探讨

社会利益多元化、特殊的“国家—社会”关系以及两党制政治模式,共同决定了那些试图影响和塑造美国内政、外交政策制定的国内政治联盟在其整合过程中趋向于形成“普遍主义—积极自由”与“精英主义—消极自由”相互博弈的政治二元结构,即两个主要的国内政治联盟分别以民主、共和两党作为各自利益的代表,推动公共政策议程朝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⑬植根于美国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周期性变化,以两党背后两大主要政治联盟间的政治力量对比和利益冲突程度为划分标准,联盟重塑与政党重组在理论上会构建出四种不同形态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图2 美国政党政治格局的周期演化逻辑

的政党政治格局,从而产生差异化的经济、社会 and 外交影响。^⑤

1. 非对等极化(deeply but not closely divided): 两党及其代表的政治联盟处于力量失衡状态且双方利益冲突较大。这一格局意味着美国政治一党独大,处于强势地位的政党—政治联盟完全主导了美国内政外交的走向,并且其政策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牺牲弱势一方利益的基础上。从理论角度看,此种形态容易存在于经济自由放任式发展、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贫富悬殊、社会结构失衡且话语权掌握在既得利益阶层(民主发展尚不充分)的时期。在美国历史上,这一形态出现在从19世纪后期一直到大萧条前的镀金时代。“精英主义—消极自由”是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理念的核心。

2. 非对等协商(neither deeply nor closely divided): 两党及其代表的政治联盟处于力量失衡状态但双方利益冲突不大。这一格局意味着美国政治虽然一党独大,但两党及其代表的政治联盟在重要利益上的一致性大于分歧,因而各自的党派属性(partisanship)被弱化。此外,双方可通过利益交换(trade-off)尽可能增进各自利益,尽管弱势一方的妥协更大。从理论角度看,此种形态同样容易形成于社会结构失衡且话语权掌握在既得利益阶层(民主发展尚不充分)的社会条件下,只是其经济前提不再是自由放任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模式,而是国家资本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等分配结构相对均衡的资本主义模式。在实践中,此种形态尚未在美国出现。

3. 对等协商(closely but not deeply divided): 两党及其代表的政治联盟力量均衡且双方利益冲突不大。这一格局同样意味着美国政治中党派属性的弱化,但由于主要政治力量势均力敌,因此双方需要更多谈判与相互妥协才能达成政策一致,利益交换的难度较非对等协商形态更大。从理论角度看,此种形态容易出现在政治民主取得长足进步,经济发展状况良好并且在政府的有效干预下,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分配结构相对均衡的时期。^⑥在美国历史上,

这一形态主要存在于“新政时代”,即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普遍主义—积极自由”是这一阶段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理念的核心。

4. 对等极化(deeply and closely divided): 两党及其代表的政治联盟势均力敌且双方利益冲突较大。这是以力量和利益为标准划分的四种形态的政党政治格局中最为糟糕的组合和最为极端的形态。在这一形态下,不仅没有任何一支政治力量能够主导国内政策议程,而且双方立场相去甚远,很难达成共识与妥协,因而极易引发政治僵局和国内治理的低效甚至失效。从理论角度看,此种形态容易出现在民主充分发展但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分配结构失衡的时期。在美国历史上,这一形态主要存在于当代(即“新镀金时代”或20世纪70年代以后)。“精英主义—消极自由”与“普遍主义—积极自由”分别成为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理念的核心。

上述类型化研究表明,美国的政党政治格局在理论上存在四种不同形态,并且始终处于周期性演变状态之中。在这一周期性演变背后,是美国政治中的两大过程性要素——联盟重塑和政党重组——在发挥推动作用,而其根源则是美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具有的阶段性和周期性(见表1)。

表1 美国政党政治格局的四种形态

利益冲突 \ 力量对比	力量对比	失衡	均衡
	大	非对等极化	对等极化
	小	非对等协商	对等协商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按照笔者的这一类型划分,美国的政党政治极化格局被进一步细化为两种不同的形态:非对等极化和对等极化。历史与现实表明,这两种形态的政党政治极化有着全然不同的动因、特征及影响,因此有必要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其进行区分,从而帮助我们在已有相关研究基础上深化对极化的理解,并为后续更有针对性地探究当代美国的政党政治极化提供学理基础。

四、联盟重塑、政党重组与 当代美国的政党政治极化

(一)联盟重塑、政党重组与美国政党政治格局的历史演化概述

1. 民主、共和两党“非对等极化”时期(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

19世纪中后期美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与古典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的如日中天,植根于南北战争后美国政治联盟重塑与政党重组带来的日趋显著的政治精英主义倾向。^⑤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后,以共和党为代表的东北部—西部政治联盟逐渐成为美国政治中的主导力量。这一主导性联盟由东北部的金融、工商业利益集团与西部的农牧业利益集团构成,主张联邦主义、高关税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以保护国内产业、加速推进工业化及海外扩张。由此,共和党逐步演化为社会既得利益阶层——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和维护者。按照美国政治学家卡尔·拉德(Carl Ladd)的说法,共和党成了“工业国家党”^⑥。很大程度上,正是当时在美国国内占据主流地位的上述施政理念,加剧了19世纪后期伴随美国高速工业化而来的社会贫富分化现象和对以弱肉强食为基本法则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仰。例如,在美国内战前,全国范围内几乎没有资产达百万以上的富豪,而在内战后的短短二三十年内,以石油和铁路大亨等为代表,美国的百万富翁开始急速增长,到1892年时超过4000人。以此为背景,东北部的工业、金融寡头和中西部的农牧场主才被美国作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描绘成经济上贪得无厌的利益追逐者和美国政治逐渐走向腐败的幕后操纵者,而这一历史阶段则被他称为“镀金时代”。

镀金时代共和党“一党独大”的另一面,是正在形成中的现代民主党及其施政理念。此前,民主党一直奉行“杰克逊式民主”,认同政府是必要的“恶”这一自由主义理念。然而,镀金时代的工业化使美国的社会结构出现剧烈分化,农民、工人和广大新进来移民成为美国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民主党随之

逐渐转向其当代理念,主张“积极政府”(active government),用以保护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中下层民众的利益。此后,关于华盛顿究竟应该管控还是顺应自由市场才能推动美国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的争论成为美国政治的核心议题。

镀金时代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及各自政治联盟政治力量对比与利益冲突的现实,使“非对等极化”成为美国政治过程的常态。由于共和党代表的东北部—西部政治联盟相对于以民主党为代表的南方政治联盟具有压倒性政治优势,因而在此期间共和党及其自由放任政策始终主导着国内政治议程。其间,由四位共和党资深参议员——罗得岛州的纳尔逊·奥尔德里奇(Nelson Aldrich)、艾奥瓦州的威廉·艾利森(William Allison)、康涅狄格州的奥维尔·普拉特(Orville Platt)和威斯康星州的约翰·斯普纳(John Spooner)——组成的保守派联盟(Big Four)牢牢掌控着国会权力。到20世纪初,随着四位议员的离世或式微,共和党内出现了保守派与进步派的分裂,进而导致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幸运地成为自19世纪末起一直到大萧条前唯一的民主党候选人赢得总统宝座。然而,共和党的内部分裂很快便让位于党间斗争:正是共和党进步派对威尔逊时期的进步主义改革持激烈反对意见,才使得当时的政党政治极化程度达到历史高点。^⑦结果是,20世纪初昙花一现的进步主义改革并未扭转共和党的自由主义路线,也没有解决美国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问题,反而使20世纪20年代成为美国历史上自由放任政策登峰造极的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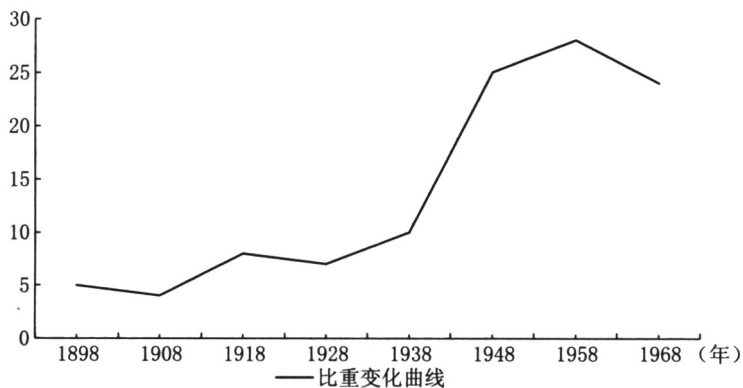
2. 民主、共和两党“对等协商”时期(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

1950年,美国政治学会(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PSA)下设的政党研究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极具影响力的研究报告,声称自20世纪30年代以后,美国的政党政治已呈现出日益明显的非政治(apolitical)特性,两党政治斗争彻底成了过去式。^⑧的确,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的政治图景已远不如19世纪末那样党派极化、充满斗争,而是越来越

越朝着政治光谱的中心靠拢。此外,民主党在这一时期迅速崛起为一个与共和党势均力敌的强大政党,“一党独大”格局不复存在。正如政治学家弗拉基米尔·奥兰多·基(V.O.Key)指出的,随着罗斯福新政的开展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民主党及其代表的社会中下层正日益成为政治主流,社会阶级作为美国不同党派利益标签的现象一去不复返了。^⑪

上述巨大政治变迁的出现,植根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国内政治联盟重塑和政党重组。以大萧条带来的变革呼声为强大动力和催化剂,美国政治开启了其发展历程中最重要的一轮政党重组——1932年重组。^⑫在这轮重组中,民主党的势力范围从美国南方迅速扩展到了东北部,其崛起使得当代美国政治的两党对等模式彻底成型。^⑬凭借当时极为有利的时代条件,民主党及其当代自由主义开始在美国政治中占据上风。以罗斯福新政为标志,民主党在实践中逐步完成了自由主义从反政治权力到反经济权力、从有限政府到积极政府、从经济的放任模式到凯恩斯主义模式、从信奉发展理念主导的消极自由到提倡平等理念主导的积极自由,以及从政治文化的精英主义到普遍主义等的过渡,从而形成了自由主义的民主党式变体。^⑭

在实践中,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美国经济在政府主导下实现了高速、均衡发展。其中,现代制造业



资料来源: Sarah Binder, “The Dynamics of Legislative Gridlock, 1947-1996”,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3, No.3, 1999, pp.519-533.

图3 美国国会中“温和派”所占比重变化,1898-1968年(单位:%)

的崛起使镀金时代造成的社会贫富分化和阶级冲突逐渐淡化。政治领导人由此得以在一系列议题领域找到一个国内政治、社会的“最大公约数”^⑮。正是基于社会阶层分化日趋模糊的现实,美国政治学者沃尔特·伯纳姆(Walter Burnham)在对这段历史进行回顾和总结时才写道:“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或许可以被描述为美国政治发展史上一个令人极为困惑的时期,因为那个时候美国国内缺乏一种阶级分明的政治秩序。”^⑯

社会阶层差异的缩小以及利益冲突的弱化,致使美国的社会结构连同政治意识形态在此期间开始日益呈现出一种“中间化”的演化趋势。这种社会现实反映到国内政治层面,便集中表现为国会参、众两院中的两党“温和派”势力开始逐渐占据政治主流(见图3),并且议员的“跨党派”投票也逐步成为国内政治过程中的普遍行为模式。此外,伴随民主党及其当代自由主义理念的崛起,两党对等模式形成,因此任何国内政治倡议要想在国会两院通过,都需要两党间的相互妥协与合作。

正是上述一系列有利的时代条件,包括联盟重塑、1932年政党重组及其带来的经济均衡发展、社会结构中间化以及意识形态淡化,才使得美国政治在新政期间,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打造出一种两党“对等协商”的形态,由此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当代自由主义政治、经济议程的落实和扩展。当然,

“对等协商”的政治基础——新政联合体——本质上是美国南方和东北部政治力量相互妥协的结果,“东北部—南方”主导性国内政治联盟的出现成为当代自由主义和自由国际主义分别在美国内政、外交领域担纲引领的强大支撑。^⑰然而,在美国经济、社会发展周期性定律的作用下,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后凯恩斯主义政治经济模式暴露出的问题,以及当代自由主义因民权运动等产生的过度伸展,这一主导性政治联盟最终走向了瓦解并引发美国政治的新一轮联盟重塑

和政党重组。

(二)联盟重塑、政党重组与当代美国政党政治极化的动因、特征及影响

1.对等极化:当代美国政党政治极化的形态及其动因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政党政治极化现象日益突出、程度逐渐加深,以至于达到甚至超越了此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国内外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已有很多,笔者在既有研究综述部分将其归纳为四种研究模式,并指出了其中存在的不足。按照本文的分析框架,当代美国政党政治极化的特殊性在于20世纪70年代的国内政治联盟重塑经由政党重组,将美国的政党政治格局塑造成了史无前例的民主、共和两党“对等极化”这一极端形态,这就清晰地揭示出为何其极化程度远甚于过去。具体而言,经过这一轮联盟重塑与政党重组,美国的政治版图发生了深刻变化:民主党代表的东北部—西海岸政治联盟与共和党代表的南方—中西部政治联盟最终定型。二者在力量对比方面趋于均等,但利益冲突程度却日渐加深,这就导致美国国内不再存在一支能够完全左右内政、外交政策议程的主导性政治力量(如镀金时代),抑或是可以通过协商与利益交换达成政策共识的两个政治阵营(如新政时代),而是出现以零和博弈思维看待彼此并且势均力敌的两大政治联

盟,从而给当代美国政治生态的恶化埋下伏笔。追根溯源,这一轮联盟重塑、政党重组和两党对等极化形态的形成,涉及当代美国经济、社会和政治过程的多方面复杂动因。

首先,当代美国国内经济和产业结构变迁导致的社会利益冲突是新政时代东北部—南方主导性政治联盟瓦解和两党对等极化格局产生的首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先是因越南战争引发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后又因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而使其“金元帝国”风光不再,甚至造成一次经济危机。^⑧所有这些困局反映出当代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走到尽头、美国经济竞争力——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现代制造业优势——已大不如前。结果是,当代美国开启了一项不可逆转并影响至今的经济进程——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这一进程对多元化的国内社会利益产生了明显的差异化影响,其中作为制造业中心的东北部遭受的打击最为严重。在纽约、宾夕法尼亚、伊利诺伊及密歇根等传统制造业大州,工人的就业情况比南方糟糕许多,工厂倒闭成为普遍现象(见表2)。^⑨整个20世纪70年代,东北部制造业就业岗位缩水56.7万个,某些地区的情况甚至比大萧条时还糟糕。^⑩到1980年时,东北部制造业人口占全国的比重由1940年的三分之二降至一半。^⑪与东北部相反,南方工业化起步

表2 1970-1980年美国国内各地区非农就业增长率(单位:%)

地区	平均数	标准差	最低值	最高值
东北部	18.9	10.4	-1.1	44.7
新英格兰	24.7	11.9	14.2	44.7
中大西洋地区	13.9	10.6	-1.1	28.1
五大湖区	16.9	5.3	12.4	25.8
南方	41.0	10.7	25.1	63.4
东南地区	41.6	12.4	25.1	63.4
西南地区	39.4	5.5	34.3	47.0
西部	49.1	20.9	17.7	90.3
大平原地区	31.9	9.2	17.7	45.3
山区	65.8	18.9	36.0	90.3
太平洋沿岸	44.7	4.3	40.1	47.4
整个美国	36.7	19.9	-1.1	90.3

资料来源:U.S.Department of Labor, <http://www.dol.gov/general/topic/statistics/geography>。

不久、起点更高,工业经济更多以新兴高科技企业和国防军工产业为主,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反而变得更为繁荣。^⑤基于这一现实,越来越多的财富五百强企业逐渐告别东北部老旧的“铁锈地带”,选择落户南方新兴的“阳光地带”。^⑥

在上述背景下,以蓝领阶层、劳联—产联组织和传统产业为主体的东北部政治联盟与以企业主及新兴产业为主体的南方政治联盟开始在利益选择上分道扬镳,分别倒向了民主党的当代自由主义和共和党的保守主义经济理念,加之产业地理和人口规模两方面出现的“南升北降”趋势,最终使东北部和南方形成了经济意义上的对等极化格局。

第二,当代美国的社会结构因人口和阶层的剧烈变化而趋向分裂,又在民权运动、反文化运动和肯定性行动之后因大众政治崛起带来了社会中下层政治影响的持续上升,这就为政党政治的对等极化提供了社会基础。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国内的人口迁移使其政治版图趋于“两极化”:一极是作为广大外来移民目的地的、以多种族和中下层为主体构成的东西海岸及五大湖区,它们成为自由化政策和民主党的支持者;另一极则指的是由中产阶级构成的、以新兴产业为主体的南方和中西部小城镇区域,它们成为保守派以及共和党的国内社会基础。^⑦另一方面,与镀金时代类似,当代美国社会贫富分化的日益严重也与政治的不断极化互为因果。对于中下层美国普通民众来说,20世纪70年代以来工资性收入增速落后于通货膨胀速度,尤其是新自由主义浪潮及经济金融化和去工业化趋势,导致美国少数精英和广大民众间的收入差距不断增大。^⑧例如,美联储2011年发布的《2007–2010年美国家庭财产变化报告》显示,2007年美国家庭财产净值的中位数为12.64万美元,而2010年下降到7.73万美元;扣除通货膨胀因素,这一数据等同于1992年时的水平;^⑨然而,美国1%的最富有家庭占全民财富的百分比却由2007年的34.1%上升至2009年的

37.1%。^⑩在这一趋势之下,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于2015年底发布的一项题为《美国中产阶级的衰退》的报告显示,美国成年人的中等收入人群为1.208亿,低收入和高收入群体的总数则为1.213亿,中产阶级人数首次跌破成年人口总数的一半。^⑪这就意味着,随着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结构被日益侵蚀,美国社会已走向两极分化。

前文提到,当代美国不同社会阶层间的财富和收入差距整体上仍小于20世纪初,因而单纯的经济—阶层模式无法解释当代美国政党政治极化的程度为何更深。如果我们把联盟重塑、政党重组等过程性变量纳入分析范畴,就可以很清楚地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20世纪70年代以来,民权运动导致的少数族裔政治权利的实质提升、反文化运动兴起对于政治精英主义的反叛,以及肯定性行动的推进对于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伸张,大幅增加了社会中下层包括边缘群体的政治话语权,大众政治崛起的趋势变得不可逆转。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政治决策不再像镀金时代那样是由一小撮聚集在“烟雾缭绕之室”(the small smoking room)的政治经济寡头所能决定的,而是力量日趋对等且彼此利益冲突的两大政治联盟及其分别代表的精英主义与普遍主义相互博弈和斗争的结果。这就大大加深了美国政治极化的程度和两党博弈的烈度。

第三,面对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结构和产业地理变化引发的南北利益对等分化,以及社会结构变迁与大众政治兴起带来的阶层利益对等冲突,民主、共和两党基于自身利益而不失时机地主动调整了各自的竞选战略,从而在政治上加速并强化了联盟重塑与政党重组的进程和效果。其中,共和党“南方战略”(the Southern Strategy)成功推进尤为引人注目。其结果是,民主党在南方的影响力日趋式微,越来越成为一个立足于东北部和西海岸的政党;^⑫而共和党则跨越“梅森—狄克逊线”(the Mason–Dixon Line),成为南方各州的主导力量。^⑬例如,在194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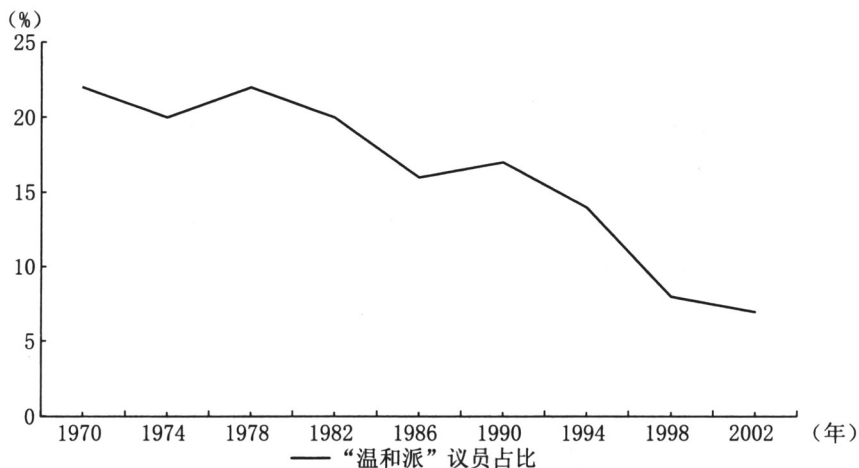
杜鲁门主义出台之时,来自南方的民主党国会议员占国会中民主党全部议席的60%;而到1980年时,这一数字已降至不足40%。^④到2000年共和党候选人乔治·W.布什(George W.Bush)赢得美国总统大选时,其选票基本上被锁定在一个巨大的“L”形区域,即从蒙大拿州向南到亚利桑那州再折向北到佐治亚州。至此,新政时代美国东北部温和派共和党人(又被称为“洛克菲勒”共和党人)已经从党团(party caucus)中彻底消失,共和党因此变得越来越保守化。与此同时,国会中的民主党人则越来越集中于东北部与西海岸等社会利益更倾向于自由化的区域。例如,曾经作为两党激烈竞争赛场的新英格兰地区,冷战后彻底成了民主党的票仓。自然地,新政时代南方保守派民主党人逐渐式微,民主党党团因而进一步向左靠拢。这一联盟重塑与政党重组完全逆转了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美国国会各州选派议员所具备的跨党派特征。基于此,当代美国国会成为以党派划线的政治斗争的场所,而政治制度及其一系列改革只不过是政治过程造成了两党对等极化后,双方博弈可资利用的工具和引发的后果(见图4)。

2. 当代美国政党政治对等极化的实践特征及其影响

作为美国政党政治格局尤其是极化的极端表现

形态,当代美国政党政治的对等极化在实践中除拥有广义政党政治极化的特征——两党意识形态和政策立场差异明显且各自内部同一性较高——以外,还具备一些重要的个性化特征,进而产生了特殊的政治、经济、社会 and 外交影响。

首先,在政治层面,当代美国政党政治的对等极化使“跨党派”投票模式逐渐被日趋严格的政党纪律所取代,府会分立和对立成为常态,并且与19世纪末的非对等极化不同,在野党具备了在国会制衡执政党的强大能力,因而政治僵局乃至政府关门屡见不鲜。^⑤例如,在1994年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美国政治形成了“金里奇的众议院”与“克林顿的白宫”相互对立和斗争的局势。在这次选举中,共和党取得了众议院多数地位,该党著名保守派代表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则出任众议院议长一职。在克林顿政府的剩余任内,白宫与国会在内政外交等一系列问题上产生了激烈的斗争,直至最后以国会对克林顿发起弹劾达到高潮。^⑥毫无疑问,对等极化这一形态不仅极大恶化了美国国内政治生态,使在野党完全成为说“不”的政党,否决政治开始大行其道,而且极大降低了美国政府的决策效率乃至国家治理效率,对美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中国学者阎学通就指出,冷战后中美实力差距迅速



资料来源:Keith Poole and Howard Rosenthal, “Nominate Score Data”, <http://voteview.uh.edu/>。

图4 美国国会“温和派”力量的衰落,1970—2002年

缩小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内改革效率的差异,即近30年来美国国内几乎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的经济社会改革,反而陷入无休止的党派斗争之中。^④

其次,在经济与社会层面,当代美国政党政治的对等极化导致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出现分裂,形成了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两条并行不悖的发展路径。^⑤在经济政策上,自20世纪80年代初的“里根革命”起,反映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的减税、平衡预算以及小政府成为主流,从而一方面令美国经济逐步扭转了新政时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带来的一系列困境,重新迸发出创新活力,进而为20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革命以及全球化的推进奠定了基础;但另一方面,这一经济发展模式也加剧了美国社会贫富分化和经济金融化趋势,因而成为2008年经济危机进而社会危机爆发的远因。在社会政策上,反映当代自由主义理念的“肯定性行动”、多元文化主义以及多语教育等得到学术界和主流媒体的大力支持,进而逐步演化成为一种所谓“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因此,美国以“精英主义—消极自由”与“普遍主义—积极自由”为特征的二元结构在当代美国政党政治对等极化的背景下,分别占据了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主流。这一分裂现象表明,美国国内在此期间存在两种相互矛盾又势均力敌的政治诉求:一是希望共和党人确保美国的自由与安全,二是希望民主党人保障美国的社会多样性和开放特征。这一独特现象引发的后果是,两种发展路径在很大程度上都走向了各自的极端: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狂飙突进恶化了美国的经济结构进而阶层结构、加大了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并最终酿成次贷危机;政治正确理念的过度发展则使身份政治大行其道,在阶层分化的背景下反过来进一步加深了美国的社会危机。

最后,在外交层面,当代美国政党政治的对等极化导致美国的对外政策越来越难以摆脱国内政治博弈的影响,“政治不再止于水边”(politics no longer stops at the water's edge)。前文提到,在镀金时代非

对等极化的政党政治格局下,美国的对外政策成为共和党及其代表的东北部—西部政治联盟利益的体现,而新政时代对等协商的政党政治格局,推动民主、共和两党在东北部—南方主导性政治联盟支持下形成了强大的“冷战共识”(the cold war consensus)——推行自由国际主义战略,通过安全优先、自由贸易、盟友体系、海外干预和多边主义,与苏联展开战略较量。所有这些历史案例使结构主义视角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有效分析工具。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后,围绕对外政策的两党分野成为影响美国外交的一大变量,这一趋势在冷战后进一步加剧。一方面,传统制造业的衰落使东北部和西海岸(如加利福尼亚州)的工商业集团和劳工阶层成了国际经济竞争的受害者,他们随之从自由贸易的提倡者变为保护主义的支持者。^⑥经济和就业困境还使东北部—西海岸政治联盟希望美国减少海外干预、进行战略收缩,将资源投入到国内问题的解决中。同时,随着南方军工产业的壮大,军事开支的转移支付效应对东北部更为不利,因此民主党人“要黄油不要大炮”,主张美国削减军费开支,通过多边合作和国际制度低成本地发挥全球领袖作用。^⑦另一方面,新兴产业不断崛起的南方则有全然相反的诉求:一是主张通过扩展自由贸易增强美国经济活力,而非回到大萧条前的保护主义;^⑧二是认为自由贸易与全球利益扩展必然需要美国强化海外干预,因而美国需要增加军费、推进对外战略扩张;三是认为美国霸权地位的维护必须摆脱来自国际制度和多边主义的束缚。上述两大政治联盟近乎相反的外交利益诉求,使得20世纪70年代以来特别是冷战后的美国外交日益具有鲜明的党派特征。例如,无论是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还是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民主党总统的对外政策理念总是建立在多边主义、国际制度、公平贸易(fair trade)、降低军费开支比例甚至推进战略收缩的基础上,或者用奥巴马的话说,即“不做蠢事”(do not do

stupid stuff, DDSS)^⑨。反之,共和党总统的外交政策理念则总是建立在单边主义、自由贸易、增加军费以至于推动全球战略扩张的基础上,这一点在小布什任内得以鲜明体现。上述现象导致美国对外政策(尤其是冷战后)的一致性和连贯性明显削弱,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漂移”。在两位美国政治学者看来,正是国内政治的对等极化致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美国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在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后冷战时代逐步走向了瓦解。^⑩

(三)断层极化:特朗普现象、桑德斯现象与美国政党政治极化新态势

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开启并于冷战后逐步深化的区域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已经缓慢冲击和重塑了美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那么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则使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包括经济、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以一种加速度的方式在美国国内全方位突显了出来。这一发展趋势进一步撕裂了美国社会,进而在政治上推动民主、共和两党及其代表的两大国内政治联盟的立场更趋极端。结果是,2016年美国大选至今备受瞩目的特朗普现象,以及与之同时出现并可能深刻影响民主党2020年大选进程的桑德斯现象,标志着美国政党政治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形成了引人瞩目的三大“断层线”。

一是政治联盟断层线。2016年美国大选让人印象最深的非常规变化是20世纪70年代后逐步成型的民主党东北部政治联盟出现了重大分裂。一直以来,这一联盟都是由新英格兰(New England)、中大西洋(Middle Atlantic)和五大湖区(Great Lakes)三部分构成的,然而在此次大选中,五大湖区——即传统制造业和白人蓝领阶层集中的“铁锈地带”——几乎所有州都从蓝变红,成了共和党和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实际上,按照美国政治学家拉里·巴特尔斯(Larry M. Bartels)的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起,白人蓝领便已逐步开始疏远民主党。其中,首先是基于种族

主义和传统价值观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分布在南方各州)瓦解了“新政联合体”,使美国南方彻底倒向共和党;此后,又由于经济、就业和移民等问题,南方地区以外的白人蓝领作为身处全球化和自由市场体系失意一端的人群,开始日益反对激进的以民主党为代表的东西海岸精英和外来移民。^⑪因此我们在看待2016年美国大选结果时,如果采用历史视角不难发现,白人蓝领阶层对民主党的疏远不过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政治发展趋势的延续,并非突变。^⑫趋势延续导致的政治版图剧变,反映出民主党政治联盟内部的矛盾已到达临界点,也表明当前美国的政党政治在时隔近半个世纪后又一次面临联盟重塑与政党重组的可能性。结果是,两党及其政治联盟近年来在对等极化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了一条泾渭分明的断层线。一方面,两党联盟内部多元性进一步消失、一致性进一步增强;随着白人蓝领阶层倒向共和党,民主党联盟的主体构成越来越朝着少数族裔方向发展,共和党则日益成为一个白人的政党。另一方面,两大联盟之间的差异进一步增大,在涉及内政外交的几乎所有议题领域,美国政治的极化程度都在加剧,而且除传统的经济、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外,移民问题、族群矛盾以及政治正确等成为全球化负面效应持续显现背景下美国政治新的博弈焦点和冲突来源。

二是意识形态断层线。20世纪70年代美国国内政治联盟重塑与政党重组所导致的对等极化,使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不断加深,进而表现为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分别主导了经济、社会领域的发展进程。随着2016年大选后新一轮联盟重塑与政党重组趋势的出现,尤其是国内政治联盟断层线的形成,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极化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一方面,民主党内激进派—进步主义者影响与日俱增、传统温和派力量趋于弱化,使民主党作为整体进一步“左”转。这一趋势在2020年美国大选民主党内初选中桑德斯的领跑和前副总统约瑟夫·拜登

(Joseph Biden)的失意中得以充分体现。此外,民主党初选制度的改革也是对这一趋势的强烈反映:自2020年起,民主党内771位超级代表——通常被视为党内主流温和派的象征——将不再在决定党内候选人命运的全国代表大会第一轮投票中行使投票权,这就大幅削弱了传统建制派候选人的优势,从而为激进主义者提供了“逆袭”机会。^⑩另一方面,共和党内极端保守派的崛起,则成为该党不断“右”转的信号。这一点在特朗普执政团队的构成及其就任以来推行的一系列经济、社会政策中已经被充分体现。同样重要的是,近年来两党意识形态断层线的形成,除受到传统的左、右之争加剧推动外,还在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及其冲击,为两党的意识形态之争注入了全球主义与本土主义两大相互对立的观念元素,从而使之变得更为复杂。在这一过程中,民主党及其代表的自由主义越来越成为全球主义的信奉者和支持者,而共和党及其代表的保守主义则日益朝本土主义方向靠拢。这一新的意识形态极化结构加深了两党之间的观念鸿沟,致使与之相关但传统上属于非核心范畴的议题——包括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之争、移民、族群冲突等——成为美国政治的新焦点。^⑪

三是文化—价值观断层线。20世纪60年代以前,整个美国社会文化—价值观的核心一直是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即前文提到的“瓦斯普”或WASP文化)。著名的“熔炉论”就认为,外来移民进入美国后都会被这一主流文化—价值观所同化,由此成为美国“合众为一”的重要注脚。^⑫然而随着20世纪60年代以后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尤其是当代美国政党政治对等极化格局下民主党及其当代自由主义在社会文化领域的显著优势,“瓦斯普”文化的核心地位开始受到冲击,并且其程度随着美国人口结构不利于白人的变化趋势而日益加深。^⑬结果是,近年来美国社会矛盾的加剧和特朗普现象的出现,使得以白人至上主义为核心的种族主义社会思

潮迅速崛起,其中以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代表的另类右翼群体在文化—价值观领域主动向多元文化主义发起了“反击”。在他们看来,美国的“白人认同”正在受到运用“政治正确”和“社会正义”来削弱白人和“白人文明”的多元文化力量的攻击。^⑭这就意味着,当代美国的“文化战争”在特朗普执政后进入了一个烈度更高的新阶段,即从围绕“我们是谁”(who are we)的争论和博弈上升到关于“谁是美国人”(who are Americans)、“美国是谁的美国”(to whom America belongs to)的抗争,由此加深了不同社会群体的文化—价值观裂痕。^⑮

毫无疑问,上述三大断层线的形成,进一步加剧了美国政治和社会的分裂与极化程度,因此笔者将后金融危机时代尤其是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政党政治形态的最新变体描述为“断层极化”。需要指出的是,“断层极化”只是对等极化的衍生形态,在政党政治形态划分中仍从属于对等极化。也就是说,近年来美国政党政治极化出现的上述变化只是程度变化,并未扭转对等极化模式,因为按照本文提出的力量对比与利益冲突两个划分标准,当前美国两大政党及其政治联盟依然势均力敌且存在明显利益冲突,只是冲突程度进一步加深。由于程度变化引发了美国政治生态的变化并对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走向产生了影响,为体现这种变化及影响,笔者提出了“断层极化”这一更具针对性的描述性概念。在政治实践中,“断层极化”到目前为止已经带来三个方面的主要影响,并且其影响仍处于发酵和扩展中,需要继续予以密切关注。

首先,“断层极化”使美国两党斗争进一步升级,政治生态极端恶化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仅从2019年初民主党重新取得众议院多数席位的第116届美国国会开幕至今,两党之间的恶斗便已导致美国政府出现史上最长时间停摆(长达35天)、民主党围绕特朗普“通话门”发起弹劾,以及2020年总统国情咨文期间佩洛西手撕国情咨文文件等事件。这些事件充

分表明,当前民主、共和两党在对等极化基础上的“断层极化”,已经使政治精英完全将党派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进而对美国民主造成极为严重的伤害。其结果是,美国政治已陷入“两党斗争升级—政策难产甚至失效—国家治理失能—社会矛盾加剧—两党斗争进一步升级”的恶性循环。

其次,“断层极化”扩大了美国两党意识形态鸿沟、重塑了其结构,从而加剧了双方的意识形态对立,使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党派色彩更为浓厚。以经济议题为例,“如何应对全球化挑战”已成为民主、共和两党意识形态分歧的核心问题之一。一方面,民主党支持全球主义的势头,很可能使其在这一轮联盟重塑与政党重组后彻底失去白人蓝领的支持。考虑到该党在移民问题上的开放态度,这一趋势将变得不可阻挡。^⑨最终结果是,民主党政治联盟将在此轮重组后转化为由以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白人、少数族裔及城市人口组成的具有全球主义倾向的群体。另一方面,白人蓝领倒向共和党的原因在于经济和就业,即特朗普关于重振制造业、“美国优先”以及“让美国再次伟大”等本土主义解决方案使这一社会阶层看到了有别于新镀金时代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解决自身最为关切的就业问题的前景。如果这些经济政策成为共和党的主流,该党就有望将白人作为一个整体巩固为其核心政治联盟。因此,特朗普现象反映出今后共和党可能会成为代表白人蓝领阶层与南方连同农村地区白人保守派的本土主义政党。

最后,“断层极化”在社会文化领域打破了新镀金时代多元文化主义的主导态势,引发了白人至上主义和种族主义等极端社会思潮的强烈反弹,使美国的社会矛盾和族群冲突进一步激化。从20世纪70年代起一直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在当代自由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伴随全球化浪潮席卷美国社会的背景下,美国国内的文化—价值观冲突虽一直存在,但始终处于潜伏状态。然而,以经济危机

和多元文化主义走到“政治正确”的极端为转折点、以特朗普现象的兴起为催化剂,近年来美国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冲突呈现出井喷式爆发的态势。以2017年8月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的种族暴力事件为标志,美国对等极化的两大政治联盟间以文化—价值观为断层线的对峙和冲突达到一个新的高点。这一趋势严重撕裂了美国社会、损害了美国国家认同,使国内社会的“部落化”特征日益明显。毫无疑问,这种撕裂和损伤对美国以“合众为一”为根本历史经验的社会发展模式构成了严峻挑战。

五、结论

在美国政治研究中,当代美国的政党政治极化是一个兼具重要学术价值和强烈现实意义的研究议题。经过对国内外学界既有相关研究成果的系统回顾,笔者发现,如果我们以美国政治研究的三个主要维度——政治制度、政治结构和政治过程——为出发点进行分析,目前已经形成的四种研究模式无一例外地聚焦于制度和结构两个维度,而对过程维度的关注极为有限,因此无法有效回答诸多关键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本文试图将美国政治的过程性变量纳入对当代美国政党政治极化的研究中,从而形成一个更为完善的系统分析框架。基于此,笔者引入了联盟重塑与过程重组两个美国政党政治研究中的重要过程性变量,从美国特殊的“国家—社会”关系出发,梳理出了二者与美国政党政治格局变迁之间的因果逻辑链条,表明作为因变量的美国政党政治格局是在以植根于国内周期性经济、社会发展的政治联盟重塑为核心变量、以政党重组为中介变量的双层传导作用下不断动态演进的。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政治力量对比和利益冲突程度作为界定标准,把美国的政党政治格局在理论上划分为非对等极化、非对等协商、对等协商和对等极化四种形态。

在构建了本文的核心分析框架后,笔者以历史

和现实为考察案例,运用该框架重点回顾和探讨了美国政党政治格局自19世纪后期以来的演变历程及其内在逻辑,指出当代美国政党政治极化的本质特征在于其以20世纪70年代的国内政治联盟重塑和政党重组为动因,形成了民主、共和两党连同各自背后政治联盟之间的对等极化这一最极端形态,从而清晰地揭示出为何当代美国政党政治极化的程度前所未有,并进一步分析了这一极化形态所独有的主要特征及其带来的深远政治、经济、社会影响。最后,笔者沿用本文的分析框架对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美国政党政治发展的最新动态进行了分析,认为当前美国的政党政治格局已形成断层极化这一对等极化的衍生形态,其特点在于两党对等极化的整体态势虽未改变,但双方极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国内政治—社会裂痕进一步增大,因而有必要将其与新镀金时代时期的对等极化进行区分。此外,特朗普现象和桑德斯现象的兴起很可能意味着美国政党政治新一轮联盟重塑与政党重组进程的开启,所以需要学界给予更多关注和研究。

注释:

①“Letter from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to the Speaker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December 17, 2019, the White House,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letter-president-donald-j-trump-speaker-house-representatives/>.

②在参议院的两次弹劾投票中,民主党议员无一例外地投了“有罪”票,而共和党方面除犹他州参议员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在第一次投票中投出“有罪”票外,均一边倒地投了“无罪”票。无独有偶,在此前的众议院两轮投票中,两党议员的投票结果也几乎完全以党派划线。相关投票记录可参见美国国会网站。参议院投票记录:<https://www.congress.gov/116/crec/2020/02/05/CREC-2020-02-05-pt1-PgS936-2.pdf>;众议院投票记录:<https://www.congress.gov/116/crec/2019/12/18/CREC-2019-12-18-pt1-PgH12130.pdf>。

③Francis Fukuyama,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 p. 505.

④David Brady and Hahrie Han, “Polarization Then and Now: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Pietro S. Nivola and David W. Brady eds., *Red and Blue N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Causes of America’s Polarized Politics*,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6, pp. 119–151.

⑤Keith T. Poole and Howard Rosenthal, “The Polariz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46, No. 4, 1984, pp. 1061–1079.

⑥张业亮:《“极化”的美国政治:神话还是现实?》,载《美国研究》2008年第3期,第8–9页。

⑦古典自由主义世界观的核心是个人主义—理性主义,方法论是实用主义基础上的改良主义。这一理念认为:(1)政府是必要的“恶”,为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必须对政府的权力进行严格限制;(2)人类理性可以使个体成为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和维护者,因此在经济活动中,市场是“一只无形的手”,可以自动调节经济运行,国家不应干预经济生活;(3)对于现实政治和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应该通过法律方式和合法程序进行渐进性的、进步的改革,而非诉诸革命。古典自由主义推动美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实现跨越式发展。此后,进入“镀金时代”的美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暴露出一系列问题,进而催生出反思古典自由主义理念的当代自由主义。这一“改良版”的自由主义认为:(1)古典自由主义只看到政治权力扩张会损害个人自由,却忽视了经济权力扩张同样是对个人自由的侵害,因此经济平等才会带来政治民主;(2)为了实现经济平等,政府必须在经济活动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概言之,古典自由主义的实质是反政治权力,当代自由主义的实质则是反经济权力。对于上述两种自由主义的系统分析和总结,参见王浩:《美国政治的演化逻辑与内在悖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8期,第64–87页。

⑧Michael Barber and Nolan McCarty,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Polarization”, in Jane Mansbridge and Cathie Jo Martin eds., *Negotiating Agreement in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2013, p. 20.

⑨Larry M. Bartels, *Unequal Democrac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Gilded Age*,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8.

⑩Nolan McCarty, Keith T. Poole and Howard Rosenthal,

Polarized America: The Dance of Ideology and Unequal Riche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6.

⑪这一思潮主要源自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弥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以及罗伯特·诺奇克(Robert Nozick)等政治哲学家。参见David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chapter 1。

⑫Geoffrey C. Layman, Thomas M. Carsey and Juliana M. Horowitz, "Party Polarization in American Politics: Characteristic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9, 2006, pp. 83-110.

⑬David W. Brady, Hahire Han and Jeremy C. Pope, "Primary Elections and Candidate Ideology: Out of Step with the Primary Electorate?" *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 Vol. 32, No. 1, February 2007, pp. 90-91.

⑭Alan I. Abramowitz, *The Disappearing Center: Engaged Citizens, Polarization, and American Democrac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49.

⑮对国会两党极化的专门分析,参见谢韬:《美国国会两党分化的原因及后果》,载《国际论坛》2009年第1期,第65-71页。

⑯Barbara Sinclair, *Party Wars: Polar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Policy Making*, Norman, OH: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2006, chapter 3.

⑰Andrew Gelman et al., *Red State, Blue State, Rich State, Poor State: Why Americans Vote the Way They Do*,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chapter 6.

⑱James D. Hunter: *Culture Wars: The Struggle to Define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1; Morris P. Fiorina et al., *Culture War: The Myth of a Polarized America*, New York: Pearson Longman, 2005.

⑲Daniel Bell, *The End of Ideology: On the Exhaustion of Political Ideas in the Fiftie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0.

⑳Nicole Rae,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Liberal Republic—ans from 1952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㉑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2014, p. 428.

㉒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张用生物学家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认为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准则。其代表人物是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㉓James L. Sundquist, *Dynamics of the Party System: Alignment and Realignment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3, pp. 28-32.

㉔James Holt, *Congressional Insurgents and the Party System, 1909-1916*,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81-94, pp. 106-120.

㉕Thomas A. Hirschl, et al., "Politics, Religion, and Society: Is the United States Experiencing a Period of Religious Political Polarization?" *Review of European Studies*, Vol. 4, No. 4, 2012, pp. 95-109.

㉖Christopher P. Muste, "Bringing Culture Back In: Social Group Polarization and the 'Culture Wars' in the U. 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Vol. 2, No. 20, 2012, pp. 12-22.

㉗Alexia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3, p. 58.

㉘Robert Dahl, *Pluralist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Conflict and Consent*, Chicago: Rand McNally, 1968.

㉙Richard Bense, *Sectionalism and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1889-1980*,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4, p. 7.

㉚[英]约翰·密尔:《代议制政府》,汪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8页。

㉛Edward Chester, *Sectionalism, Politics, and American Diplomacy*, Metuchen: Scarecrow Press, 1975, p. 4.

㉜Peter Trubowitz, *Defin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Conflict and Chang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㉝James L. Sundquist, *Dynamics of the Party System: Alignment and Realignment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p. 14; Jerome M. Clubb, William H. Flanigan and Nancy H. Singale, *Partisan Realignment: Voters, Parties and Government in American Histor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0, pp. 21-24; Arthur Paulson, *Electoral Realignment and the Outlook for American*

Democracy,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③④“普遍主义—积极自由”反映的是当代自由主义理念,提倡结果平等;“精英主义—消极自由”反映的是古典自由主义理念,提倡机会平等。参见资中筠:《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15-320页。

③⑤对于美国政治的周期性及其与政党重组逻辑关联的系统分析,参见谢韬:《从大选看美国的历史周期、政党重组和区域主义》,载《美国研究》2012年第4期,第30-45页。

③⑥ Peter Trubowitz and Nicole Mellow, “Going Bipartisan: Politics by Other Mean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20, No. 3, 2005, pp. 433-454.

③⑦ Richard Hofstadter,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45.

③⑧ Carl Ladd, *American Political Parties: Social Change and Political Response*, New York: W. W. Norton, 1970.

③⑨ James Holt, *Congressional Insurgents and the Party System, 1909-1916*, pp. 81-94, 106-120.

④⑩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Toward A More Responsible Two-Party System: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Political Part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44, No. 3, 1950, pp. v-96.

④⑪ V. O. Key Jr., *Politics, Parties, and Pressure Groups*,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1958, p. 274.

④⑫关于这轮政党重组对于美国政治影响的系统性论述,参见David Burner, *The Politics of Provincialism: The Democratic Party in Transition, 1918-1932*, New York: W. W. Norton, 1967; Gerald Gamm, *The Making of New Deal Democrats: Voting Behavior and Realignment in Boston, 1920-194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Carl Degler, “American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Rise of the City: An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51, June 1964, pp. 41-59.

④⑬ Richard Bense, *Sectionalism and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1880-1980*, p. 62.

④⑭凯恩斯主义是指通过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来扩大总需求和增加就业,参见Leon Baradat, *Political Ideologies: Their Origins and Impact*, New York: Pearson Education, 2009, p. 134;在当代自由主义者看来,古典自由主义关于自由意味

着不受他人干涉而做出选择的定义是一种消极自由;积极的自由应是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贫困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要想实现这些目标,政府就必须在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作用。

④⑮ Peter Trubowitz and Nicole Mellow, “Going Bipartisan: Politics by Other Mean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20, No. 3, 2005, pp. 433-454.

④⑯ Walter Burnham, *Critical Elections and the Mainsprings of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1970, p. 304.

④⑰对“东北部—南方”主导性国内政治联盟在美国自由国际主义崛起方面作用的分析,参见王浩:《社会联盟与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逻辑(1945-2015)》,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7期,第58-88页。

④⑱越南战争的久拖不决使美国的财政赤字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达到400亿美元,并导致美元的购买力较1945年时下降60%。进入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不断恶化,出现私人海外投资增长与外贸盈余减少并存的局面,由此酿成一场持续一年的经济危机。此外,贸易赤字的增加迫使美国动用大量黄金维持美元汇率,进而导致美元危机频发、黄金储备下降,美元地位急剧衰落。参见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599页;周琪主编:《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6页。

④⑲ Advisory Commission on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AC-IR), *Regional Growth: Historic Perspective*, Washington, D. C.: ACIR, 1980.

④⑳ Fred Shelly, et al., *Political Geograph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996, pp. 257-267.

④㉑ Advisory Commission on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AC-IR), *Regional Growth*, p. 43.

④㉒ Leonard Wheat, “The Determinants of 1963-77 Regional Manufacturing Growth: Why the South and West Grow”,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Vol. 26, No. 5, 1986, pp. 635-659; R. D. Norton and John Rees, “The Product Cycle and the Spatial Decentralization of American Manufacturing”, *Regional Studies*, Vol. 13, 1979, pp. 141-151; Neil Smith and Ward Dennis, “The Restructuring of Geographical Scale: Coalescence and Fragmentation of the Northern Core Region”, *Economic Geography*, Vol. 63,

No. 2, 1987, pp. 160–182; Bernard Weinstein and Robert Firestone, *Regional Growth and Decline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Praeger, 1978.

⑤ John Agnew,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 Economy: A Regional Geogra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61–185.

⑥ William Frey, “Metropolitan Magnets for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October 2003.

⑦ Larry M. Bartels, *Unequal Democrac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Gilded Age*, chapter 1.

⑧ “Changes in U. S. Family Finances from 2007 to 2010: Evidence from the 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 *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Vol. 98, No. 2, 2012, p. 17.

⑨ Annalyn Gensky, “How the Middle Class became Underclass”, February 16, 2011, https://money.cnn.com/2011/02/16/news/economy/middle_class/index.html.

⑩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 Is Losing Ground”, *Pew Research Center*, December 9, 2015, <http://www.pewsocialtrends.org/2015/12/09/the-american-middle-class-is-losing-ground/>.

⑪ Earle Black and Merle Black,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the South*,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Nicol Rae, *Southern Democra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⑫ Martin Wattenberg, “The Building of a Republican Regional Base in the South: The Elephant Crosses the Mason–Dixon Lin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55, No. 3, 1991, pp. 424–431.

⑬ Richard Bense, *Sectionalism and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1889–1980*, p. 383.

⑭ Sean Theriault, “Party Polarization in the U. S. Congress: Member Replacement and Member Adaptation”, *Party Politics*, Vol. 12, No. 4, 2006, pp. 483–503; Jeffrey Stonecash, Mark Brewer and Mack Mariani, *Diverging Parties: Social Change, Realignment, and Party Polarization*, Boulder: Westview, 2003.

⑮ Elizabeth Drew, *Showdown: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Gingrich Congress and the Clinton White Hous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6.

⑯ 参见阎学通:《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

⑰ 周琪主编:《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第234页。

⑱ Lloyd Rodwin and Hidehiko Sazanami, eds., *Deindustrializ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he Exper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Boston: Unwin Hyman, 1989, pp. 29–59.

⑲ Drummond Ayres, “Developing Sunbelt Hopes to Avoid North’s Mistakes”,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2, 1976.

⑳ I. M. Destler, *American Trade Politics*, Washington, D. 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2, p. 66.

㉑ Colin Dueck, *The Obama Doctrine: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Toda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㉒ Charles Kupchan and Peter Trubowitz, “Dead Center: The Demise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2, No. 2, 2007, pp. 7–44.

㉓ 在这一方面,民主党一系列社会政策的基本取向——包括移民和“政治正确”理念——加剧了白人蓝领阶层的不满,这种不满在2016年大选中演化成为一种政治上的反弹。

㉔ Larry M. Bartels, *Unequal Democrac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Gilded Age*, p. 112.

㉕ Lee Ross, “Democrats Poised to Limit Influence of Superdelegates in Presidential Nominating System”, *Fox News*, August 24, 2018, <https://www.foxnews.com/politics/democrats-poised-to-limit-influence-of-superdelegates-in-presidential-nominating-system>.

㉖ 谢韬:《从历史的终结到美国民主的溃败》,载《当代世界》2017年第1期,第33–37页。

㉗ 参见周琪主编:《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第2章。

㉘ 参见王浩:《“特朗普现象”与美国政治变迁的逻辑及趋势》,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第141–148页。

㉙ 对另类右翼的专门探讨,参见张业亮:《另类右翼的崛起及其对特朗普主义的影响》,载《美国研究》2017年第4期,第9–31页。

㉚ 关于“我们是谁”的争论,参见 Samuel P. Huntington,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5.

㉛ Michael Lind, “This is What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litics Looks Like”, *Politico*, May 22, 2016. <http://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6/05/2016-election-realignment-partisan-politicalparty-policy-democrats-republicans-politics-213909>.